

北京作家与房山之缘

张玉泉

从上世纪 50 年代初至上世纪末，曾有多位北京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背景之下，在房山或深入生活，或专题采访，或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搞“四清”，或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他们人生历程中，曾有一度与房山人结缘，他们深感房山的山青水绿、人气十足，和房山人摸爬滚打，与房山人休戚与共是幸运的。许多房山人和事曾深深地打动过他们，他们又用妙笔去打动别人。他们与房山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瓜葛。

几十年来笔者因喜欢文学，一直关注那些北京作家在房山的行踪。由于条件限制，所掌握的情况十分有限，再加上时间久远，难免以一漏百，敬请谅解。

一、下放劳动的作家

浩然是房山的干部群众比较熟悉的农民作家，他一直“坚持写农民，为农民而写”的方针。他跑房山最勤，相对待得时间最长，他的成名作《艳阳天》曾影响过房山的几代人。50 年代末，北京市农业战线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比、学、赶、超的运动。1958 年夏收，城关公社北市村的小麦亩产过“黄河”，超过了当时北京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南韩继村。浩然于当年夏末深入到北市村调查了解北市村小麦亩产是怎么超南韩继的？采取了哪些有利措施？他写出《北市人迈开了大步子》的报告文学，回答了这些问题。刊载在下半年《北京文学》上。那时我刚认识浩然。他当时住在房山东街原县委财贸部北院北屋里。后来他又与赵日升、（房山文化馆工作）苏宝敦去岗上大队采访全国劳模吴春山。

60年代初，他只身深入到房山的红粟之乡南尚乐公社广润庄采访，深入到当时全国劳模杜宝珍家里，同他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发现老杜的结发妻子与他相濡以沫，从许多细微之处倾心关照丈夫起居饮食。浩然深受感动，终于写出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小说《妻子》（见浩然小说集《春歌集》）情节生动，感人至深。

“文革”中北京作协被解散，大批作家下放到京郊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浩然下放到周口店公社新街村，（据我老家二里地，使我有幸多次接近他）。在那里他同干部群众水乳交融，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他甚至把患严重传染病的干部接到自己家中治病，让老伴伺候。他在新街下放劳动的两年中，我和另一位青年成了他文学知音，是他引领我们走上文学道路。在新街他几乎成了大队的秘书，帮他们起草文件。写大批判稿件，写黑板报，写汇报材料，编文艺节目等。

70年代初，他恢复工作回到作家协会，曾几次应邀到房山给业余作者授课，培养文学新人。1973年初冬他到房山文化馆连续三天讲写作课，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受到广大文艺爱好者的好评。

改革开放初期，他又深入到十渡文化站，继续写他的反映改革开放后农民生活新变化的长篇小说《苍生》。在那里生活非常艰苦，每顿饭都要自己动手，常常是一日两餐，每餐一菜，真可说得上“吃的是草，吐的是奶”，通宵熬夜是经常的。一次我去十渡文化站看他，他显得很清瘦且疲惫。回来时让我把他半麻袋书稿带回，嘱我有机会给他送到家去。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写完计划生育故事集《太阳在心底燃烧》之后，他像老师批改学生作文一般给我修改后，他又作序。他在序中大力鼓励我：“他的工作是一流的，作品也是一流的，让人一看就能抓着读者的心。”这极大地激

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此外他还多次给我题写书名，如：《周口店往事漫记》《张坊风物》《精美的石头会唱歌》等等。我对他的支持和鼓励一直心怀感激。在他重病期间我去医院看他，逝世后我曾写悼念文章在报上发表，后被他女儿收集在《浩然纪念集中》。他在房山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管桦，房山人也应认识他。早在 60 年代初期，他就爬上了房山的小西藏蒲洼最高的山峰，当时农业学大赛的典型富合，在那里他采访了半个多月，写下报告文学。同时还辅导了小青年刘金绶写出《富合姑娘》的报告文学，登载当年的《北京文艺》上。

“文革”前夕，他和原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在良乡镇黄辛庄村体验生活。后来他又隐姓埋名到良乡蚕农场潜心创作，完成了抗日战争题材的巨著《将军河》。直到离开场子时农场职工们才知道他就是写《英雄小雨来》的著名作家管桦。

1970 年至 1972 年，“文革”后期管桦夫妇又下放到良乡镇詹庄和鱼儿沟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管住在生产队饲养室，同饲养员同住一室，他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每天早出，背粪筐去拾粪，白天到园田拔草。有时夜里还给老饲养员炉红薯吃，帮他喂牲口。

时任良乡公社党委书记的李丙田曾两次调他到公社机关当参谋、分管全社下放干部，都被他婉言谢绝。他真心愿意待在基层，扎根在群众中。在詹庄村的劳动生活给予了他深刻影响。

1972 年底，他调回北京作家协会，担任领导工作期间他曾多次回房山，或参观，或视察。在参观云居寺时与时任房山文物局副局长的苏宝敦有过较深的接触，并给他留下了墨宝。

1998 年底，我陪时任房山区人大副主任的李丙田同志去管桦家看望他。得到了他们夫妇热情接待。当时我正想写以一篇《管桦夫妇在良乡》的文史稿件，就顺便引导他们提供在良乡下放劳动时的一些情况。他们忆起在良乡下放劳动的往事，正是我感兴趣的资料。我的文史稿形成后曾寄给管老审定。

雷加，（原名刘涤、刘天远）也是资深老作家，1939 年后任延安文协秘书长，1937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半月随笔二集》曾获鲁迅文学奖。他于 1972 年至 1974 年下放到石楼公社石楼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是下放干部组长，参加大队领导班子工作。他整日跟社员群众一起劳动，除到田园、场院劳动，就是下到大田中，干力所能及的活茬，跟社员打成一片。他细心观察了解各行业各种性格的人。在后期的作品中能找到当地农民的影子。

我没能近距离接触过他。有次下乡去石楼大队，干部们在开会，他没列席班子会。我打听老雷在否，不巧他回市休假了。虽未能接触过他，但对他的文学成就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如果接触了他，我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也不会谈过去的创作情况。没机会接触他、熟悉他、只好做罢。

以上三位实力派作家，文革前后都曾出任过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在北京文坛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早在上个世纪“文革”前后，我还曾有幸了解或接触过一些名家，对他们的情况也是一知半解。如上世纪 60 年代初著名的剧作家杜印夫妇，曾下放在岳各庄村劳动锻炼，他们笔名叫林金，代表剧作有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等。

二、搞“社教”运动的作家

吴伯萧是我在上世纪 60 年代“四清”运动中认识并熟悉的老作家，那时我有幸分到河北公社和高教部干部组团，

搞“四清”（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财务）运动。高教部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著名的散文家吴伯萧先生任檀木港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他在延安时期写的散文《一辆纺车》早就编入中学课本。可惜的是那时一门心思只抓“四清”，免谈文学创作，哪怕工作之余，人家也回避谈文学。一次我在檀木港村与吴老一起劳动，曾提起他的文学成就，老先生表示沉默不语。我很难堪，再也不敢提起这个话题，就这样我遗憾地一次次错过向他探讨文学创作的机会。但我相信这段热火朝天的生活对他后期创作一定会产生深刻影响的。

陈昌本，原北京市委宣传部出版处处长。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后曾派往我区琉璃河公社开展路线教育工作，约8个多月。那时我正在该公社任副职，与他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只觉得他工作热情极高且肯干。对群众非常亲热，给我的感觉很好。然而，我一直不了解他是个小说作家，在公社工作之余，他总是深入到村民中去聊天（搜集创作素材）。他发表在《十月》杂志（81年4月号）上的小说题材就取自于琉璃河公社福兴村王家。搜集创作素材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平日他不显山、不露水。直到他的作品发表出来，并出版了“希望文学”丛书《花脚王开棺》，我见到了书，才恍然大悟，陈昌本原来是较有成就的作家。该书收集了他中篇小说两篇，短篇小说7篇，约16万字。

在该书后记中他说：“我的根的确在农村，我的魂的确在农村。我不该把根挖出来……而应该深入农村使自己的魂不丢。这本小说集就是我追求的产物。读者可以从书的人物身上寻觅到故乡亲人，京郊朋友的面貌……”

三、与房山有瓜葛的作家

刘绍棠，通州儒林村人，著名作家。作品颇丰。在我的印象中，他重新复出文坛后似乎没来过房山，但他在房山业余作者的心目中具有较高的威信，不少同志都熟悉他，有的

还得过他的辅导，或指点。90年代初，笔者写完民间故事集《京西风物典故》，曾由时任北京作协副秘书长的赵金九老弟领我去绍棠家请他作序。绍棠夫妇待人诚恳热情。不久他就写完了序言，并寄给我。他在文章中颇有建树地指出：“我喜欢张玉泉的作品，是因为我和他都心悦诚服地拜民间文学家为师，向民间文学求艺。”他还鞭策自己：“工作之余，倾心写作，几年来，年年有成果，这在基层领导干部中是很难得的，这也是自我人才开发，阳关大道，前程似锦。”

林斤澜，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浙江温州人。60年代初曾任过《北京文学》主编，出版过小说、散文集多部。是北京第三届文学节终身奖获得者。60年代曾在我区山区下乡蹲点体验生活。1965年他在了解黄山店供销社背篓商店先进事迹的基础上，又对房山乃至京郊学“背篓精神”的情况深入调查，写出《背篓精神开新花》的纪实散文，发在当年《北京文学》杂志上。他在文章中说：“从这个深山小店里，看到了北京到处在学习背篓精神。是学着又创造着，是赶着又超着。从此一步步跨出了商业范围，成为一种精神，在社会上行走……”他的文章在传播和弘扬“背篓精神”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他还在《新居》的一篇散文里，描绘了我区邮政系统的先进人物、铁脚板任成水的事迹。80年代初他曾到燕山给燕化业余作者授课，给人印象深刻。80年代末，他曾与作家赵大年到韩村河、十渡参观访问，写出了散文《轻重小驴车》，道出了“这条山沟通延安”的感情！表达了他对十渡人民的无限深情。

还有一位资深编辑、散文作家李凤翔。他原为北京日报副刊编辑。后调入《北京晚报》任副刊部主任，该同志为人、为文都是最好的。在职期间他经常跑房山，跟房山的新老作家、撰稿员混得特熟。他很平易近人，接近群众，脚踏实际为我区广大业余作者做了不少嫁妆衣。房山业余作者所以有

较强的实力，这与他的帮助不无关系。早在 1998 年初，凤翔曾为我和王洪钟合写的《良乡风景名胜》一书写过序言：《文友的祝贺》。文中他十分热情地说“我为玉泉老兄又有新的写作成果而高兴”“我们是相识几十年的老熟人了，那还是 70 年代早期我在北京日报文艺部当编辑时……到京郊各县跑的活儿基本上都我的。”他说：“玉泉在县、社工作几十年，酷爱写作，因而我们联系一直不断，他每次出书都送我一册。”文中他向笔者祝贺。又鼓励笔者继续努力。

另外，《京郊日报》原副刊编辑、老作家王保春先生在任期间，也曾多次跑房山，一是给业余作者讲写作课；二是找业余作者约稿或面对面的改稿，密切房山业余作者的关系。1985 年我在区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期间，保春曾在《喜鹊》副刊上开辟了计划生育题材的作品专栏，既有力地宣传了计划生育工作，又培养了一批业余作者。所以他也算与房山有瓜葛的人。

四、房山籍的北京作家

房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在这里成长或走出好几位知名作家，如苗培时、赵日升、刘文田、许谋清等。

苗培时，房山坨里人，早年毕业于我区长育（洪寺）高小。中学时代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到延安，是个大名鼎鼎的大众文学家，然而我始终没拜读过他的作品。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初，才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他的长篇小说《慈禧外传》连载。在这部作品中，苗老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慈禧从青春少女演变成女皇，主宰朝政 47 年的独特经历，描绘了宫廷内触目惊心的斗争。情节跌宕。

改革开放后他十分关注家乡的建设和发展。1992 年“十一”房山报创刊时，他在创刊词中说“房山是我的故乡、我的祖居之乡……我是喝房山的水，吃房山的粮长大的……房

山养育了我”晚年的苗老竭力回报家乡，为家乡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参与贾岛祠的修复，热心公益事业等等。

赵日升，本区韩村河镇大次洛村人，诗人，小说编辑。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分配到琉璃河中学任教，那时我在琉璃河公社工作，一度交往密切。后来他调任房山区文化馆从事“大房山报”“房山文艺”的编辑工作，为辅导业余作者做过许多工作，后调入北京从事专职小说编辑工作，曾出版过《岁月之窗》等诗集。

许谋清，浙江省晋江人，美术学院毕业，他虽然不是房山籍人，但在房山文化馆工作多年，对房山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了如指掌，生活根底较深，故此调入北京后潜心进行小说创作。作品格调新颖，引人入胜。这跟他多年扎根房山不无关系。因此也把他列入房山籍作家。

刘文田，本区窦店镇卢村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创作系，后供职于北京电视剧创作中心。曾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烙饼队》等。改革开放初他曾以房山城关镇马各庄村蔬菜专业户袁景春为原型，创作了电视剧《犟种》，而蛮生京郊。他是个很有个性的“犟种”。以后又写了不少有影响的剧作。

此外，在房山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还成长出一批草根作家，他们虽然土生土长，但也是名符其实的北京作家。（有的成为全国名作家），其代表人物是现任房山区文联主席史长义。他们为实现房山的“三化两区”建设，共筑中国梦，一直笔耕不辍。

总之，无论北京作家或土生土长的北京作家，无论以何种名义，何种方式或完成何种任务，他们自始至终沿着一条轨迹，贯穿一条红线：“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深入生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他们把目光转向了乡野，亲吻房山这块热土，欣赏着这里的一枝一叶，关照着这里各色各样的

人生，由于他们对房山的乡土物事耳濡目染，从而使他们笔下的人物、事件就有了别样的气息和绵长的厚味，他们的创作自觉不自觉地便植根本土，融入了乡俗。从而创作了大量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这便是房山给予北京作家的厚礼。也是北京作家们对房山的丰厚回报。一句话：北京作家与房山有缘。